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 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困境

弗雷德里克·哈里斯 维维安娜·里韦拉-布尔戈斯 著 薛雁方 译

【摘要】近年来,围绕种族、民族等社会认同的政治运动在美国不断兴起,经济不平等也显著加剧,在美国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阶级政治重新浮现。然而,美国的政治行为研究却往往将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彼此孤立,鲜有将二者结合起来的分析。文章追溯了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的发展脉络。首先,文章分析了“美国例外论”,对其认为社会阶级力量无足轻重且不考虑种族影响的论证前提提出了质疑。其次,文章批判地回顾了关于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传统研究,认为这些研究过分依赖于利用社会阶级的客观指标来预测公民的政治偏好和政治参与。再次,文章讨论了种族与政治领域中社会认同研究的激增以及该领域向交叉学科研究方法的转变,同时对这些研究几乎未涉及社会阶级分析提出了质疑。最后,文章讨论了少数关注到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相互交织、相互影响的研究,并强调了拓展这类研究对于理解当代美国民众的政治行为的必要性。

【关键词】种族;阶级;政治行为;美国例外论;非裔美国人

【作者简介】弗雷德里克·哈里斯,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政治学系;维维安娜·里韦拉-布尔戈斯,美国纽约州立大学巴鲁克学院政治学系。

【译者简介】薛雁方,上海社会科学院国外社会主义研究中心。

【原文出处】《国外理论动态》(京),2024.1.148~159

一、引言

自美国建国以来,种族与阶级始终是其社会中强大的政治因素。在有关美国政府和政治的一系列研究中,如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美国政治制度的发展、政府政策的设计和执​​行以及公民生活的本质等,总能看到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的身影。但是,种族与阶级却往往被孤立地运用于相关研究,很少有学者将二者结合起来进行分析。几个世纪以来,种族问题早已成为美国政治和社会的恒定要素,而非一个影响力时隐时现的历史概念。近年来,由种族、民族和性别等因素引发的政治运动在美国不断兴起,甚至开始主导美国的政治进程,其中尤以“黑命贵”(Black Lives Matter)为代表。在这个经济不平等不断加剧的时代,在美国似乎销声匿迹了几十年的阶级

政治重新浮现,这一点从遍布美国政治光谱的左、右翼民粹主义浪潮中不难看出。

在美国民众的生活中,种族话语与阶级话语紧密交织,共同影响着人们的政治行为,难以拆分。然而,关于社会认同和美国政治行为的研究却往往孤立地分析种族因素或阶级因素的影响;即使能将二者结合起来,通常也认定一个居于主导地位,另一个处于从属地位。对种族与阶级整体动态的分析通常也是将两者的影响拆解开来,分析一方的影响可以在多大程度上由另一方加以解释。就社会阶级的政治影响而言,无论是在大众话语还是在美国政治行为的研究文献中,对工人阶级政治行为的分析往往只聚焦于白人工人阶级,而忽视了有色人种内部阶级分化日益加剧的客观事实。

就阐释美国政治中长期存在的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困境而言,也许再没有比2016年总统大选更好的例子了。对于唐纳德·特朗普的意外当选,美国政治学界的专家学者作出的两种不同解释都强调了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对推动白人选民支持特朗普所起的决定性作用。“失利者论”(the left-behind thesis)对2016年大选结果作出了以阶级为中心的解释,认为白人工人阶级的收入缩水和经济困境是促使他们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然而,2016年大选所处的经济复苏背景以及大量穷人(包括白人和非白人)选民对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有力反驳了这一观点。“身份威胁论”(the status threat thesis)则作出了以种族为中心的解释,认为不安全感是白人支持特朗普的主要原因:少数族裔和外来移民逐渐增多,社会地位不断提高,同时美国作为全球超级强国的地位动摇,都激起了白人内心强烈的不安和焦虑。

从现有研究来看,美国白人对种族和移民的政治考量要比他们在经济方面的失意感更能有效地解释其投票行为。正如佐尔坦·哈伊纳尔(Zoltan L. Hajnal)指出的,作为预判投票行为的依据,个体的种族归属比其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等因素更加有效。^①阿什利·贾迪娜(Ashley E. Jardina)也认为,拥有强烈种族认同感的白人比缺乏强烈的种族认同感的白人更加坚定地支持2012年的威拉德·罗姆尼和2016年的特朗普。^②围绕2016年美国大选结果,学者们运用不同来源的数据对种族与阶级的不同评估标准和统计方法展开了详尽分析,其结果有力证明了种族因素比阶级因素更能有效地解释美国选民的总统选举偏好。

目前看来,尽管以种族为核心的解释与以阶级为核心的解释难分高下,但无论是有关有色人种认同的研究还是有关白人政治行为的研究,都鲜有学者将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结合起来展开实证分析。正如乔·索斯(Joe Soss)和维斯拉·韦弗(Vesla Weaver)所言:“种族与阶级通常被建构为两种可以相互替代的解释路径,它们往往作为彼此独立的变量出现在实证分析中。”^③美国民众的政治行为研究已经详尽

讨论了种族和民族因素的影响,但关注社会阶级归属的研究少之又少。就像我们在本文中所强调的,很少有学者研究美国政治中的阶级政治和阶级意识,即使最近已有越来越多的学者致力于研究种族和民族认同,但却几乎未关注少数族裔内部的社会阶级认同。这种研究的缺失将使我们无法全面认识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动态变化及其影响,特别是可能干扰我们对少数族群政治的理解。

本文将盘点过去几十年来美国政治学研究中将社会阶级作为主观认同的各种分析路径,同时探究美国政治行为研究者们尝试将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结合起来的种种努力。本文认为,如果能在研究美国民众的政治行为时将种族和民族分析与阶级认同和阶级意识分析更巧妙、更彻底地结合起来,就能更深刻地理解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给美国民众政治生活带来的复杂影响。

二、美国政治发展与“美国例外论”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几乎不关注社会阶级的原因之一,可能就在于美国通常被视作“例外”——不像其他西方国家一样拥有漫长的阶级斗争史。这一观点认为,美国工会的软弱、工人政党的缺位、工人阶级意识的薄弱,导致美国缺乏全民共享的公共品,比如真正普遍的选举权、全面的医疗保健体系、价格亲民的高等教育、持续且高效的公共安全监管等。

“美国例外论”的主要观点认为:第一,资本主义持续满足了美国工人的物质需求,因而工人对这一经济制度持友好态度;第二,工人对美国政治制度抱有积极态度,所以他们自建国起就在一定程度上融入了主流社会并成为“公民”,这在其他工业化国家的工人阶级中相当罕见;第三,两党制中的一党博得工人支持和关注,另一党则站在前者的对立面,由此弱化了工人阶级对政策的影响;第四,美国资本主义内部所谓的物质回报抑制了建立工会的诉求,催生了“美国具有大量社会流动机会”的信念,从而削弱了工人阶级的团结。

“美国例外论”本身并未认真分析过奴隶制和种

族认同的影响。维尔纳·桑巴特(Werner Sombart)指出,美国的移民群体并非一些学者设想的那般异质化,“移民的异质性阻碍了美国社会主义的发展”这个论调是站不住脚的。^④在分析了生于美国本土之外的初代移民中盎格鲁-撒克逊人和欧陆其他族裔人口的比例后,桑巴特表示,美国拥有极其同质化的人口发展特征,因此移民因素不会构成工人支持社会主义的障碍。

然而,在桑巴特的解释中,美国工人不包括奴隶的后代以及美国西部地区的墨西哥和中国裔移民,因此他对20世纪初美国工人同质性的看法是不准确的。更重要的是,桑巴特不承认奴隶制及其遗产对白人工人阶级认同的影响,也没有考虑奴隶制对美国缺少持续的工人运动、缺乏社会主义理论的影响。事实上,“美国例外论”的支持者所主张的许多因素都与奴隶制的影响直接相关,比如工人融入主流社会的程度、对资本主义物质回报的感知等。

理查德·伊顿(Richard Iton)批判了传统的“美国例外论”,认为种族观念已渗透到美国的各种制度中。“尽管我们都想把黑人在美国的存在当作微不足道的问题,但种族问题却是美国人生活中永不缺席的‘座上宾’,甚至影响着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⑤事实上,奴隶制影响了美国“公民身份”的意义,这一身份是美国白人工人阶级在追求政治和经济利益时十分珍视的。正如朱迪丝·沙克拉尔(Judith N. Shklar)所指出的,美国公民身份的最初含义是奴隶制的对照物。只有被认可为美国公民,才能获得选举权,拥有以自由工人身份赚钱谋生的权利,进而融入美国社会。奴隶则没有这些权利,他们的子孙后代在奴隶解放后仍在不断争取上述权利。

“美国例外论”的支持者强调工人融入社会的程度在抑制社会主义和工人阶级意识方面的重要性,却忽略了白人工人融入社会的前提在于将奴隶及其后代排除在“公民”之外。沙克拉尔认为:“沦为一个不完整的公民只是奴隶悲惨命运的开始。”^⑥即使是桑巴特也曾无意间提到种族因素对美国政治制度的重大影响:在这个制度中,黑人被两党视为炮灰,从

而淡化了阶级政治,加剧了南北地区差异。桑巴特表示:“黑人问题已经让美国两党不再具有任何阶级色彩,同时使人们更多地依据地理位置而非阶级归属来集结力量。”^⑦失去谋生机会或沦为苦苦挣扎的失业者,就如同被剥夺投票权一样处于被奴役状态。正如沙克拉尔所言:“工作时,你或许会认为老板如同奴隶主般残酷,但失去工作时,你会觉得自己此时才更像一个奴隶。”她还阐释了公民身份与白人工人阶级的关系:“(失去工作机会后)你将被逐出文明社会,沦为二等公民,这对白人工人来说难以接受,因为这种情形通常是黑人的常态。”^⑧

“美国例外论”不仅没有关注公民身份与奴隶制之间的关系,而且还忽略了种族等级问题。种族等级制通过那些针对黑人和其他受歧视的少数族裔群体的种族主义政策逐渐赋予了白人工人诸多非物质福利,比如公民身份。W. E. B. 杜波依斯(W. E. B. Du Bois)在其名著《黑人的重建》中指出,白人工人与黑人工人无法维持一个共同反对地主和工厂主的联盟的原因,绝不只是因为资本家们采取了分而治之、分化瓦解的策略。尽管白人工人的薪资十分微薄,或只是略高于黑人,但白人身份已经补偿给他们一笔额外的“公共和心理报酬”(public and psychological wage)。^⑨戴维·罗迪格(David Roediger)解释道,白人工人认为自己不仅是“工人”,同时还是“白人”,在这里,白人身份就是“一份专属于白人的‘报酬’”。^⑩

美国的政治行为研究者们即使曾关注过社会阶级议题,也不过是从美国工人缺乏阶级斗争和强烈的阶级意识这一假设出发的。因此,他们有可能忽略了分析美国政治行为的一个重要维度,尤其是当他们只从社会经济地位的角度考察阶级问题,而非将阶级视为社会认同的时候。美国政治研究的一些早期文献分析了工人阶级态度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系,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类文献不断减少。尽管部分研究对工人阶级政治行为和工会进行了考察,但关于社会认同的政治影响的分析却几乎只关注了少数族裔群体认同的影响。

三、社会阶级问题在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兴衰

(一)政治行为研究经典文献中主观与客观意义上的阶级

尽管当下的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几乎见不到社会阶级的踪影,但早期研究却明显包含社会阶级分析,认为社会阶级是具有政治影响的社会认同形式。彼时,行为主义政治学尚处于发展初期,而美国工人运动则处于顶峰,当时的投票行为研究论证了社会阶级与投票之间的关系。除了受“美国例外论”影响,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社会阶级分析的另一个特征是偏重客观衡量方法(借助社会经济地位模型),而非主观衡量方法(通过表达身份认同)。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一个例外是安格斯·坎贝尔(Angus Campbell)等学者关于美国选民的开创性研究,这一研究详尽周密地讨论了社会阶级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坎贝尔等学者认为,社会阶级可能在许多人心中具有“心理现实性”(psychological reality),尽管这种情感依附并无对应的组织载体,也缺乏现实的领导者和政策纲领。为了使社会阶级超越单纯的人数累积,就需要一种“同类感”(we feeling),或者如卡尔·马克思和马克斯·韦伯所说的“阶级意识”,即同一社会阶层的成员所拥有的认同感和荣辱感。

通过援引“美国例外论”,坎贝尔等学者指出,因为“美国的文化价值观坚决反对承认阶级差异”,因此要判断个体的社会阶级归属十分困难。^①有鉴于此,他们选择综合主观和客观的标准来衡量个体的社会阶级属性。客观衡量标准主要包括个体的收入水平、职业类别和受教育程度,他们认为客观指标更适于评估个体的社会阶层(social strata)归属而非社会阶级(social classes)归属。相反,主观衡量标准则是一种认同表达,可以作为个体对特定社会阶级心理归属的判断依据。然而,摆在研究者面前的一个问题是,作为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之一的职业类别与主观阶级认同的相关性通常不是很强。比如,蓝领工人常常认为自己是中产阶级,而白领工人有时则认为自己是工人阶级。坎贝尔等学者指出,对阶级

与政治行为之间关系的研究应以这些存在“阶级地位模糊性”的群体为重点,因为这种模糊性很可能蕴藏着美国阶级认同的本质。

《美国选民》一书基于1956年的一项社会调查进行了实证分析。在该项调查中,坎贝尔等学者提出了一个可以作为社会阶级主观衡量标准的问题:“大多数人都表示自己属于中产阶级或工人阶级,那么你是否曾想过/意识到自己已是这些阶级中的一员?”学者们发现:“那些承认意识到自己阶级属性的人,在政治问题上的想法和行动不同于那些表示没有意识到的人。”^②调查结果显示,大约有1/3的美国人并未意识到自己的社会阶级地位。同时,该调查提出了一系列社会阶级的客观指标,坎贝尔等学者由此发现,职业类别是政治态度和投票行为最有力的预判依据——底层民众更倾向于支持民主党,在政策上也更倾向于自由主义。尽管不同社会阶级群体的投票行为和党派归属确实存在显著差异,但阶级与政治行为之间的联系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总的来看,就美国全体国民而言,阶级与政治行为之间的关联性十分微弱。只有那些最成熟老练的选民才能将他们的阶级利益转化为相应的政治主张,坎贝尔等学者将这些群体称为意识形态拥护者或准意识形态拥护者。换言之,只有那些更热衷于参与政治的人才更有可能根据其阶级地位进行投票。

坎贝尔等学者对美国不存在严重的阶级或社会地位分化的解释,事实上附和了“美国例外论”。在讨论社会流动的相对便利性时,他们指出:“在一个开放的阶级社会中,阶级之间跨越文化界限的流动十分频繁,与这种流动渠道受阻的社会相比,出现社会地位两极分化的可能性更小。”^③尽管他们对阶级因素在美国民众政治行为中的作用给予了相当多的关注,但他们对美国选民中黑人选民的政治地位却几乎视而不见。在他们开展研究的那段时期,大多数美国成年黑人被剥夺了公民权,这些黑人并不是所谓的开放社会的一员。《美国选民》一书主要从人口流动的角度研究美国黑人,它分析了从南方迁徙

而来的黑人的特征,比较了不同地区黑人选民的政党偏好。诺曼·尼(Norman H. Nie)等学者接续这一具有里程碑意义的研究指出,只有在严重的经济萧条时期,美国才会出现阶级冲突。“这是因为经济问题虽然重要,但从根本上说,这些问题总归有回旋余地,可以得到解决。”他们认为,经济问题固然导致了阶级分化,但“美国的各社会阶级并不认为他们彼此之间是根本对立的”。这种看法严重弱化了阶级意识和工人阶级的身份认同。^④

在一项聚焦经济地位和社会阶级的研究中,凯·施洛茨曼(Kay Schlozman)和西德尼·维巴(Sidney Verba)运用主观衡量方法评估社会阶级,同时分析了失业者的政治参与情况。美国政治学界鲜有分析阶级对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的重要研究,这些早期发现或许有助于我们理解当代美国政治中隐约出现的阶级和种族政治的复兴。施洛茨曼和维巴致力于以失业者为切入点分析阶级政治,认为失业者不太可能拥有共同的阶级意识,因为他们认为自己的失业状态是暂时的。施洛茨曼和维巴还发现,美国社会文化鼓励下层阶级通过努力和积极进取走出困境,摆脱被剥夺感。然而,这一表述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美国例外论”。

施洛茨曼和维巴的核心观点是:对于因长期处于工人阶级地位或暂时失业而深陷经济困境的人们来说,如果他们内心拥护“美国梦”中的个人主义信念,就不太可能因其阶级地位而参与政治。对于那些相信他们的问题(比如失业)可以通过自助而非政府干预得到解决的人而言,阶级因素不太可能成为政治动员的基础。利用关于美国劳动力的一项调查数据,施洛茨曼和维巴向被调查者提出了一系列关于“美国梦”和工人阶级意识的问题。他们承认社会科学家对如何判断个体的阶级归属往往存在分歧,但同时也认为工人阶级的阶级认同不会影响个体的政治态度和政治行为。在他们看来,阶级认同必须与经济不公正感相结合,这种情感的核心是弱势群体与非弱势群体之间的冲突。他们用来衡量社会阶级的标准包括阶级的自我认同,以及受访者对美国

经济报酬体系的公平性、阶级冲突、工人团结的态度。研究表明,大部分受访者自视为中产阶级,同时蓝领工人几乎不存在阶级意识,但他们本应是受经济不公正感影响最大的群体。

除了分析受访者的自我认同及其对阶级的看法外,施洛茨曼和维巴还分析了阶级对政治参与的影响。他们将失业状况和职业类别(而非阶级认同或阶级意识)作为预判指标,同时控制人口变量,结果发现:“失业者显然是一个不如就业者活跃的群体,他们不太可能参加投票,不太可能参加其他政治活动,不太可能对政治感兴趣,也不太可能积极参与志愿组织的活动。”^⑤

为了考察这种关系是否扩展到具有一定阶级意识的个体,施洛茨曼和维巴考察了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或中产阶级的受访者之间的关系,以及他们的自我认同对政治参与的影响。在考察了具有阶级意识和缺乏阶级意识的蓝领工人的政治参与程度后,他们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阶级意识与政治参与之间存在明显的正相关关系。结合他们向受访者提出的关于阶级自我认同的问题以及工人是否应当团结起来的问题,施洛茨曼和维巴认为,阶级意识与政治参与之间事实上呈负相关关系。换言之,具有阶级意识的人并不比缺乏阶级意识的人更热衷于参与政治。

施洛茨曼和维巴在研究中同时关注阶级意识和种族意识,这在美国政治行为研究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们发现,受到种族冲突影响的黑人的政治参与程度要低于没有受到种族冲突影响的黑人。然而,当使用不同的调查报告和不同的种族意识作为衡量标准(即通过黑人受访者是否认为他们与其他黑人更亲近来评估种族意识)时,两位学者发现具有种族意识的黑人显然更热衷于参与政治,当前的黑人政治行为中依然存在这一现象。他们还指出,种族因素对政治参与的推动作用要大于阶级因素:种族弱势群体比经济弱势群体更能有效地利用组织机构和团体认同资源来动员政治活动。尽管施洛茨曼和维巴表示,一般来说,“阶级意识似乎并不促进政

治参与”，而且“拥有阶级意识的蓝领工人极少，即使是这些极少的蓝领工人也没有表现得更热衷于参与政治”；但他们在结论中指出，经济问题绝非无关紧要，因为阶级问题和经济问题也存在于美国政治的其他方面，尤其存在于选举政治和利益集团政治之中。^⑩

坎贝尔等学者的研究，以及施洛茨曼和维巴的研究，都详细探讨了社会阶级的作用，这与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将社会经济地位作为社会阶级衡量指标的其他经典文献形成了鲜明对比。运用社会经济地位分析社会阶级概念，早已成为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标准方法。例如，在一项关于选民投票率的重要研究中，雷蒙德·沃尔芬格(Raymond E. Wolfinger)和史蒂文·罗森斯通(Steven J. Rosenstone)将收入、教育和职业的影响分开研究后发现，受教育程度是选民投票率的有效预判指标，而收入水平的影响有限(仅限于贫困会限制投票率)，中上层阶级的职业与投票率关系不大。^⑪这些学者的研究要么不涉及社会阶级概念，要么并未将阶级作为社会认同。

同样，维巴和尼也未使用阶级概念，而是完全依靠社会经济地位模型的解释力。^⑫他们没有分别探究收入、教育和职业的作用，而是将这三种常用的客观指标结合起来，作为累加指数。他们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政治活动、公民态度呈强相关关系，公民态度包括政治效能感、政治参与感、政治责任感等。在一项关于政治参与的跟进研究中，维巴等学者认为应超越社会经济地位去考虑时间、收入和公民技能等资源，这些因素本身可能受到阶级地位的影响。^⑬虽然这些学者的确考虑了工会对培养公民技能的作用，但依然没有分析阶级作为一种主观认同的功能，也没有考虑到这种认同对公民政治参与的影响。

(二)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对美国政治行为的有限影响

一些关于美国政治的实证研究尝试通过自我认同来衡量社会阶级(将其概念化为个体所归属的社会共同体之一)，并考察其对政治行为的影响。玛

丽·杰克曼(Mary R. Jackman)和罗伯特·杰克曼(Robert W. Jackman)发现，那些自认为属于某一阶级的美国人强烈支持社会阶级概念，并更喜欢与拥有类似认同的人交往。但是，他们认为社会阶级对政治行为的影响十分有限。似乎只有当人们与所属阶级之间拥有更牢固的“情感纽带”时，阶级才会影响个体的政治偏好。这种“情感纽带”是“一个人的阶级地位体验转化为明确的政治观点的必要条件”。^⑭总之，主观意义上的阶级更适于预判个体的社会取向，而非其政治偏好。主观或客观意义上的阶级与政治态度的关联性都很弱。

凯瑟琳·沃尔什(Katherine C. Walsh)等学者也将社会阶级视为一种心理归属，认为这种心理归属由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以及将个人与其阶级利益联系在一起的不变化的社会网络共同塑造。他们指出：“人们在社会阶级中的自我定位对其政治参与有着极为重要的影响。”^⑮对于那些随着时间推移而改变其阶级认同(比如从中产阶级变为工人阶级，或者相反)的受访者，他们的阶级认同对其政治效能感、关于政府的评价抑或是直接的政治参与都无重大影响。而对于那些拥有固定的阶级认同，尤其是始终自视为中产阶级的群体而言，则更有可能持积极的政治态度并热衷于参与政治。这些结论强调了个体阶级认同的稳定性对于政治态度和行为的重要性。

同样，本杰明·索斯诺(Benjamin Sosnaud)等学者也考察了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与客观衡量标准之间的关系，进而解释了这一关系如何制约我们对阶级在美国政治中的作用的解释。对美国阶级政治淡薄的一种解释是，大多数美国人都倾向于在主观上认同自己属于中产阶级，而不管其客观阶级地位如何。索斯诺等学者因而探究了为什么一些人的主观阶级认同与其客观阶级地位一致，而另一些人——即坎贝尔等人所说的社会阶级“认同偏差者”(mis-identifiers)——却不一致。即使个体认同了错误的阶级或缺乏阶级意识，阶级也有可能影响他们的生活和政治行为。

索斯诺等学者分析了最近八次美国总统选举的调查数据,构建起一个社会阶级分析评价框架,其中包含“自我认同准确”“自我认同过低”“自我认同过高”三类。“自我认同准确”即主观阶级认同与客观阶级地位一致。如果个体的主观阶级认同高于或优于其客观阶级地位,就是“自我认同过高”。相反,如果个体的主观阶级认同低于其客观阶级地位,则是“自我认同过低”。为了判断受访者的自我认同程度,索斯诺等学者同时使用了主观和客观的阶级衡量标准。研究表明:“超过2/3的中上层阶级低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只有一半中产阶级自我认同准确,超过1/3的工人阶级高估了自己的阶级地位。”^②此外,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更了解自己的客观阶级地位。与其他族裔群体相比,非洲裔美国人不太可能高估自己的阶级地位。

索斯诺等学者还探究了形成与个体的客观经历不同的阶级认同的政治后果。他们将阶级认同的主观衡量标准对选民投票率和党派投票的影响作为因变量进行评估后发现,如果控制收入水平和种族背景等变量,则在过高的阶级认同与投票选择之间不存在显著的统计学关系。虽然最初在过高的阶级认同与投票给共和党的可能性增加之间似乎存在某种关联,但这实际上可以用收入和种族差异来解释。正如索斯诺等学者所强调的:“美国人的主观阶级认同应被视为一个重要的社会事实,它有可能与客观的阶级地位一样,以不同的方式塑造社会行为。”^③

(三)收入不平等与政治行为的关系

几十年来,关于美国收入不平等加剧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的研究激增。与其他发达工业社会相比,美国的阶级分化不减反增。尽管不断扩大的收入和财富差距已经导致了阶级政治在美国的复兴,但关于经济不平等及其对美国民主的影响的新近研究依然没有关注社会阶级。这些研究多数聚焦于金钱对政治的影响、政治极化以及人们对解决经济不平等的社会政策的态度。例如,诺兰·麦卡蒂(Nolan M. McCarty)等学者分析了经济不平等与政治极化之

间的关系。他们指出,美国富人抵制主张财富再分配的政党,而穷人则支持再分配政策,这两种观点的对立将加速政治极化。但是,这种关系也会反过来加剧经济不平等:两极分化的政党提出的政策将加剧不平等。在对政党认同与总统选举投票结果的分析中,他们将收入作为主要的解释变量,发现收入水平可以有效预测个体的党派倾向:穷人更有可能支持民主党,富人更有可能认同共和党。他们还发现,在过去的40多年中,按收入来划分党派的情况不断增加。^④

拉里·巴特尔斯(Larry M. Bartels)同样探讨了收入状况与政党认同的关系。他主要依据家庭收入水平判定阶级,更具体地说,是依据“人们在当前收入分配中的相对位置”。他交替使用了“低收入”与“工人阶级”这两个概念,用来描述从1952年至2004年期间的每个大选年中家庭收入处于收入分配最低1/3档的群体。“中等收入”或“中产阶级”是指家庭收入处于收入分配中间1/3档的群体;“高收入”则是指家庭收入处于最高1/3档的群体。巴特尔斯的研究表明,“阶级”可以有效预测政党认同、党派投票和政策偏好。他发现,“与过去150年间的大部分情况一样,经济问题在美国政治中依然至关重要,尤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而言更是如此”,因此,“阶级政治在美国不仅存在,而且发展良好”。^⑤

施洛茨曼等学者也得出了类似的结论。他们在关于经济不平等的后果的研究中指出:“经济富裕者投入了更多的资金,更积极地参加各种形式的政治活动,包括那些不用投资的活动,所以在政治上更有发言权。”“通过雇佣专业人士作为游说者的组织机构来表达政治诉求,富人也能得到更充分的代表和更积极的回应。”^⑥

然而,在这些有关收入不平等加剧的政治后果的文献中,没有任何研究将阶级认同作为政治行为的解释变量。相反,这些研究都强调个体的社会经济地位的作用,或是评估他们在不同的收入分配等级中的政治偏好。这些文献忽略了一些极为关键的问题,例如,国内民众日益加剧的收入不平等是否会

增强个人的阶级认同? 这些研究没有考虑、抑或没有从主观角度衡量阶级意识或阶级认同。除极个别文献外,这些研究也没有考察种族政治,或者对非白人群体进行扩展分析,白人在他们的研究样本中占据绝大多数,但事实上经济不平等对非白人种群的负面影响显然更大。

四、美国政治研究中的种族认同与民族认同

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的一些经典文献和大多数关于经济不平等的新近研究都没有把阶级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认同,而有关种族和民族认同的研究却具体探索了政治偏好、政治参与的政治影响。虽然后一种研究往往局限于分析有色人种,但也有一些研究从理论和实证角度探究了白人种族认同的政治影响。此外,只有少数研究同时分析了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对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的影响。

长期以来,学界一直将黑人的种族认同和种族意识视为影响美国黑人团结及其政治偏好和政治行为的心理要素。迈克尔·道森(Michael Dawson)的“黑人效用启发理论”(the black utility heuristic)是目前分析黑人种族认同的政治影响的主流方法。^②该理论从两方面解释黑人的政治行为:一是命运与共的观念;二是个体依据自身的经济状况评估政治环境的能力。就黑人个体而言,其动机往往是追求经济利益;但就黑人整体而言,通过黑人媒体、黑人组织和黑人社交网络获取关于黑人群体的信息会更有效。这就使他们越来越相信其个人命运与黑人整体的命运紧密相连。因此,“命运与共感”培育了这样一种信念:“利于群体就是利于自己。”“黑人效用启发理论”已被用来解释大多数黑人公共态度的同质性。

学者们尝试运用道森的“黑人效用启发理论”来解释拉美裔和亚裔美国人的政治行为和公共舆论。但是,“命运与共感”在这些群体中远不如在非洲裔美国人中那么强烈。^③加布里埃尔·桑切斯(Gabriel Sanchez)和娜塔莉·马苏卡(Natalie Masuoka)认为,拉美裔人的“命运与共感”是暂时的和有条件的,主要受经济边缘化和移民身份的制约。^④亚裔美国人的

泛民族认同(panethnic identity)相对薄弱,他们反而有着各种不同的次民族认同(subnational identity),将他们团结在各种次民族团体中。^⑤克劳汀·盖伊(Claudine Gay)等学者在对种族、民族、性别和宗教等四类社会群体的比较分析中发现,“命运与共感”并非非洲裔美国人所独有,也不像以前所认为的那样强烈。他们发现,白人与黑人具有相似程度的“命运与共感”,而且黑人、白人和拉美裔人所具有的阶级意识都不逊色于、甚至超过了种族意识。^⑥

正如对美国政治行为的传统研究忽视了对社会阶级的主观衡量,对少数群体的政治行为的研究通常也对阶级因素避而不谈。事实上,命运与共理论的假设前提是:种族认同比阶级认同更重要。这一假定忽略了影响非洲裔美国人的其他社会认同的作用,比如性别和性取向。

此外,并非只有少数群体才拥有“命运与共感”和群体凝聚力,最近的研究表明,白人也是如此。贾迪娜就对一些学者的观点——即白人不会考虑自己的白人身份,至少不会认为白人身份具有政治意涵——提出了质疑,并认为白人的种族认同是当代选举政治中的关键因素。在美国,人口结构的变化(非白人人口不断增长,白人即将丧失其人口多数的地位),以及美国有色人种政治和经济影响力的不断提升,已经动摇了白人的主导地位。由于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许多白人萌生出对其种族群体的归属感。

然而,白人种族认同感的增强并不一定会造成严重的仇外情绪。许多具有种族意识的白人对有色人种并无偏见,就像许多敌视有色人种的白人并没有强烈的白人种族认同感一样。贾迪娜指出,这种情况不仅涉及白人蓝领工人和白人工人阶级,“更多的白人认为其种族群体面临美国种族格局变化的威胁、剥夺和迫害”。“关于白人认同的政治并不完全、甚至并非主要植根于经济权利的被剥夺,它牵涉甚广,且更具有普遍性。”^⑦具有强烈种族认同和族群意识(即年龄较大、受教育程度较低、生活于乡村且有威权主义倾向)的白人与具有种族意识的黑人非常

相似,他们都持有一套独特的政治理念和政治行为。例如,具有白人种族意识的人更有可能支持限制移民政策和特朗普。然而,与传统观点相反的是,白人的种族认同和意识似乎与是否支持照顾少数族裔的政策(如平权法案、社会福利等)无关。而这些政策几十年来一直是研究白人种族态度的核心。

五、美国政治行为研究中种族分析与阶级分析的交汇

一些分析家认为,种族已取代阶级,成为美国政治中最主要的社会分歧,他们致力于分析社会阶级的政治影响,聚焦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另一些人则将研究重点放在社会阶级的政治影响上,他们分析的核心是白人工人阶级的政治行为,这种关注往往忽视了种族与阶级对白人以及被污名化的有色人种的双重影响。例如,杰弗里·斯托内卡什(Jeffrey Stonecash)等学者和莱恩·肯沃西(Lane Kenworthy)等学者分别研究了低收入白人的党派归属和忠诚度。前者发现,自1970年代以来,低收入白人不断向民主党靠拢。^③后者则发现,白人工人阶级对民主党的认同实际上已经有所下降。^④这与坎贝尔等学者60多年前关于美国选民的研究结论截然相反。通过综合运用阶级的主、客观衡量指标,阿伦·阿布拉莫维茨(Alan Abramowitz)和鲁伊·特谢拉(Ruy Teixeira)为白人工人阶级不再支持民主党的论断提供了更多论据。^⑤

既然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影响力存在消长变化,那么到底哪种认同更为重要呢?威廉·威尔逊(William Wilson)指出,阶级已经超越种族而成为影响黑人生活的决定性因素,对贫困黑人而言尤其如此。^⑥他认为,就决定非洲裔美国人生活的影响力而言,这是美国历史上阶级问题首次可以与种族问题相提并论。珍妮弗·霍克斯柴尔德(Jennifer Hochschild)和韦弗采用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检验了威尔逊的结论,为该论断找到了更多论据:“如果考虑到一些必要的细微差别和关注事项,威尔逊的核心论点在当下甚至比在当时更贴近现实:黑人人口内部

的阶级差异已经增长了几个数量级,他们的生活经历也相应地更加不同。”^⑦富裕黑人与贫困黑人在政治意识形态和政治效能方面存在显著差异:前者不太支持政治自由主义,并表现出更强烈的政治效能感。拉美裔的情况也是如此。不过,威尔逊明确指出,虽然阶级在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但这并不意味着美国正在成为一个“后种族主义”社会。

弗雷德里克·哈里斯(Fredrick Harris)和布莱恩·麦肯齐(Brian McKenzie)认为,黑人通常持有多种社会认同,并以此来看待和理解政治世界。他们利用非洲裔美国人政治研究中心(Center on African American Politics)和美国广播公司新闻部黑人政治调查(ABC News Black Politics Survey)2008年的统计数据,考察了受访者的阶级认同、国家认同以及他们对种族团结的信念。两位学者发现,大部分黑人更认同其所属的社会阶级而非种族群体,尤其是那些自我认同为工人阶级的黑人“更有可能相信他们与其他美国工人阶级处境更为相似,无论其种族背景如何”^⑧。另一方面,上层阶级的黑人则表现出持有个人主义价值观的迹象,这些价值观与美国的主流信仰以及与他们处于同样经济地位的美国人所持有的信仰有关。而工人阶级黑人更倾向于认为他们首先是黑人,而非美国公民。

研究结果表明,有很多因素影响了黑人的信仰,尤其是种族歧视的经历、对待种族认同的态度、社会阶级地位、居住社区的种族构成以及对财务安全的感受等。杰克曼等人发现,在非洲裔美国人中,种族纽带要比其阶级纽带更为重要,但穷人除外。他们认为,穷人与黑人这两种处于从属地位的人群都十分重视政治认同。致力于分析阶级政治和专注于分析种族认同的两派学者得出了基本相似的结论:种族划分不会削弱占主导地位的种族群体的阶级认同,而阶级划分也不会削弱处于从属地位的种族群体的种族认同。

六、结论

美国社会收入和财富不平等的急剧扩大,以及

以种族不平等或阶级不平等为中心的政治运动的兴起,为重新评估种族认同和阶级认同对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提供了契机。回顾既有研究,我们发现依然没有多少文献综合分析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对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这说明社会阶级仍未被明确视为一种重要的政治认同。但是,社会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还是提醒我们,阶级仍然是影响美国民众政治偏好和行动的的决定性因素。虽然主观的阶级认同经常作为一个问题出现在美国大选研究中,但主观的阶级认同及其对政治行为的潜在影响等话题并未得到持续关注。有人或许会把相关研究的缺失归咎于“美国例外论”:在“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下,阶级认同根本不是美国政治行为研究的重点。但是,认为社会阶级无关紧要的观点却与另一事实相矛盾,即社会阶级的客观衡量标准对政治行为有着持续的影响。除了受普遍存在的“美国例外论”的影响之外,行为主义学派没有在研究中坚持采用社会阶级的主观衡量标准的另一个原因是,在少数探讨社会阶级认同的政治影响的文献中,阶级认同对美国民众政治行为的影响被证明并非始终如一。不过,这一结论不具有决定性,它不妨碍我们进一步研究政治行为中种族因素与阶级因素之间的交互作用。如果跳出既有研究所使用的调查方法的窠臼,结合实证方法来梳理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影响,可能会得出更有意义的和更一致的结论。结合近期针对一些美国白人感觉自身地位下降的研究以及关于白人认同的政治重要性的实证发现来看,实证研究将有助于揭示种族认同与阶级认同的因果机制,并澄清两种认同发挥作用的前提条件。

正如哈伊纳尔所言,有一个问题长期没有得到解答:为何美国经济不平等的扩大没有在加剧阶级冲突的同时缓和种族矛盾?换言之,为何美国白人工人阶级没有与其他弱势群体联合起来?虽然对这一问题的全面探讨超出了哈伊纳尔的《危险的分裂:种族与阶级如何决定美国政治的胜负》一书的研究范围,但他还是将杜波依斯的“心理报酬”概念作为

答案。白人工人阶级享有一种将自己与其他少数族裔群体区分开来的特权,一旦种族界限模糊不清,他们也将丧失这种特权。因此,经济差距非但没有加剧阶级冲突和减少种族矛盾,反而促使白人工人阶级更渴望守住这种白人特有的“报酬”。实证研究方法能够让这类长期存在、但未经实证检验的杜波依斯式的问题得到解答。同样,正如黑人女性主义学者长期以来所坚持认为的那样,美国黑人、甚至大多数有色人种都拥有不止一种有着重要政治影响的社会认同。在除种族认同之外的其他社会认同中,阶级认同的作用十分显著。随着阶级分化在有色人种社群中的不断扩大,政治行为主义学者们应更加认真地思考阶级认同对这些社群政治行为的影响。

本文原载《政治科学年鉴》(*Annual Review of Political Science*)2021年第24卷,译文有删减。

注释:

① Z. L. Hajnal, *Dangerously Divided: How Race and Class Shape Winning and Losing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20.

② A.E.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Cambridge, U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19.

③ J. Sossand and V. Weaver, "Learning from Ferguson: Welfare, Criminal Justice, and the Political Science of Race and Class", in J. Hooker and A. B. Tiller (eds.), *The Double Bind: The Politics of Racial and Class Inequalities in the Americas, A Report of the Task Force on Racial and Social Class*, American Political Science Association, 2016, p. 76.

④ 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New York: Springer, 1976, pp. 27-28.

⑤ R. Iton, *Solidarity Blues: Race, Culture, and the American Left*, Chapel Hill, NC: University 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0, p. 236.

⑥ J. N.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p. 17.

⑦ W. Sombart, *Why is There No Socialism in the United States?*, p. 49.

⑧J. N. Shklar, *American Citizenship: The Quest for Inclusion*, p. 93.

⑨W. E. B. Du Bois *Black Reconstruction in America*, New York: Harcourt Brace, 1935.

⑩D. Roediger, *The Wages of Whiteness: Race and the Making of the American Working Class*, New York: Verso, 1999, p. 13.

⑪A. Campbell, P. Converse, W. Millerand and D. Stokes, *The American Voter*, New York: Wiley, 1960, p. 340.

⑫Ibid., p. 343.

⑬Ibid., p. 377.

⑭N. H. Nie, S. Verba and J. R. Petrocik, *The Changing American Voter*,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6, p. 104.

⑮K. L. Schlozman and S. Verba, *Injury to Insult: Unemployment, Class, and Political Response*,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9, p. 254.

⑯Ibid., p. 277.

⑰R. E. Wolfinger and S. J. Rosenstone, *Who Votes?*, New Haven, CT: Yale University Press, 1980.

⑱S. Verba and N. H. Nie, *Participation in America: Political Democracy and Social Equality*, Chicago: University Chicago-Press, 1972.

⑲S. Verba, K. L. Schlozman and H. E. Brady, *Voice and Equality: Civic Voluntarism in American Politics*, Cambridge, MA: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95.

⑳M. R. Jackman and R. W. Jackman, *Class Awareness in the United States*,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1983, p. 205.

㉑K. C. Walsh, M. K. Jennings and L. Stoker, "The Effects of Social Class Identification on Participatory Orientations towards Government", *British Journal of Political Science*, Vol. 34, 2004, p. 489.

㉒B. Sosnaud, D. Brady and S. M. Frenk, "Class in Name Only: Subjective Class Identity, Objective Class Position, and Vote Choice in American Presidential Elections", *Social Problems*, Vol. 60, No. 1, 2013, p. 90.

㉓Ibid., p. 97.

㉔N. McCarty, K. T. Poole and H. Rosenthal, *Polarized America: The Dance of Political Ideology and Unequal Riches*, Cambridge, MA: MIT Press, 2006.

㉕L. M. Bartels, *Unequal Democracy: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p. 95.

㉖K. L. Schlozman, H. E. Brady and S. Verba, *Unequal and Unrepresented: Political Inequality and the People's Voice in the New Gilded Age*,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18, p. 188.

㉗M. C. Dawson, *Behind the Mule: Race and Class in African-American Politics*, Princeton, NJ: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94.

㉘G. R. Sanchez and E. D. Vargas, "Taking a Closer Look at Group Identity: The Link between Theory and Measurement of Group Consciousness and Linked Fate",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69, No. 1, 2016.

㉙G. Sanchez and N. Masuoka, "Brown-Utility Heuristic? The Presence and Contributing Factors of Latino Linked Fate", *Hispanic Journal of Behavioral Sciences*, Vol. 32, No. 4, 2016.

㉚J. S. Wong, S. K. Ramakrishnan, T. Lee and J. Junn, *Asian American Political Participation: Emerging Constituents and Their Political Identities*, New York: Russell Sage Found, 2011.

㉛C. Gay, J. Hochschild and A. White, "Americans' Belief in Linked Fate: Does the Measure Capture the Concept?", *Journal of Race, Ethnicity, and Politics*, Vol. 1, No. 1, 2016.

㉜A. E. Jardina, *White Identity Politics*, p. 9.

㉝J. M. Stonecash, M. D. Brewer, R. E. Petersen, M. P. McGuire and L. B. Way, "Class and Party: Secular Realignment and the Survival of Democrats outside the South", *Political Research Quarterly*, Vol. 53, No. 4, 2000.

㉞L. Kenworthy, S. Barringer, D. Duerr and G. A. Schneider, "The Democrats and Working-Class Whites", <https://www.researchgate.net/publication/228479856>.

㉟A. Abramowitz and R. Teixeira, "The Decline of the White Working Class and the Rise of a Mass Upper-Middle Class", *Political Science Quarterly*, Vol. 124, No. 3, 2009.

㊱W. J. Wilson, *The Declining Significance of Race: Blacks and Changing American Instit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8.

㊲J. Hochschild and V. Weaver, "Is the Significance of Race Declining in the Political Arena? Yes, and No", *Ethnic and Racial Study*, Vol. 38, No. 8, 2015, p. 1250.

㊳F. C. Harris and B. D. McKenzie, *Unreconciled Strivings and Warring Ideals: The Complexities of Competing African-American Political Identities, Politics Groups and Identities*, Vol. 3, No. 2, 2015, p. 248.